

文革博物馆专集（十四）

〔编者按：最近去国而引起人们关注的王希哲是一九七四年引起全国注目的“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本刊在此转载若干资料为读者提供有关事件的背景。〕

“李一哲”大字报及其作者

岳禅

“李一哲大字报”，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长达二万余言大字报的简称。作者其实是四人，分别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由于主要执笔者为李、陈、王三人，其中李正天撰述法制部分，陈一阳、王希哲撰写民主部分，郭鸿志在理论上提供协助，但李、陈、王三人为保护年纪较大的郭，故取其名各一字作笔名成“李一哲”。

李正天，现年五十三岁，祖籍山东，出生在湖北，在广州成长。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文革时是广州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呐喊战团（简称红司呐喊）核心成员。后因“李一哲大字报”遭受批判、被捕，于一九七九年初获平反后出狱。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陈一阳，现年四十八岁，广州人。其父陈适曾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主任。文革爆发时就读广州市第十七中学高中，是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核心成员。后因“李一哲大字报”遭批判、被捕。一九七九年初获平反后出狱。现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职员，近年潜心研究哲学和玄学，著有《东方与智慧——金刚白话演绎》（北岳出版社出版）。

王希哲，现年四十七岁，祖籍四川，在广州长大。文革爆发时就读广州市第十七中学高中，是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核心成员，与陈一阳是同学、战友。后因“李一哲大字报”遭批判、被捕。一九七九年初获平反后出狱，后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十四年，一九九三年获假释，现在广州从商。（《华夏文摘》编者注：王两星期前逃亡到美国，宣布将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称他此举的目的是为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向中共施加影响。国民党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郭鸿志，文革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人事科干部，后因“李一哲大字报”遭批判、被捕。一九七九年初获平反出狱，现已退休，年前不幸中风，全身瘫痪，长卧病床。近闻情况已稍有起色。

“李一哲大字报”事件发生时已处于文革尾声，中共中央决定将政治及经济纳入正轨，准备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原宪法规定四年为一届，该届人大应在一九七〇年召开，但因文革而无法进行）。曾全情投入文革的李、陈、王、郭四人有感于新政局启端，需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及建立公平、公开的制度而建言，决定向四届人大致公开信，表达意见。内容定为论述民主与法制。李正天负责撰写法制部分，陈、王写民主部分，经过三易其稿，四人轮番修改补充定稿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这天恰恰是俄国十月革命五十七周年纪念日。

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北京路（原永汉北路，文革时改名为北京路，至今仍沿用）与中山四路（文革初期曾被北京南下红卫兵强行将整条中山路改名为东方红大道，后遭广州市民激烈反对，很快恢复原名）交界处。结果，引起全城轰动，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围睹，顿令车水马龙的闹市为之途塞。该大字报后来在不少热心市民支援下油印成小册子，广为传阅。当时正值秋季广州交易会正在进行，吸引不少外国客商注意，旋即引起全球七十二个国家、地区报导此事。当时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又惊又怒，组写作班子以“宣集文”为署名，对“李一哲大字报”进行多番批判，反倒使“李一哲大字报”越批越香，名扬海内外。

□原载《明报月刊》 96年六月号 输入：周其弘

∞ ∞ ∞ ∞ ∞ ∞ ∞ ∞ ∞ ∞ ∞

他对大字报仍眷恋不舍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正当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份长达万言，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交界处，引来万人围观，交通为之堵塞。这“李一哲大字报”在四人帮严密控制舆论的中国大陆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其后，大字报的作者李正天和王希哲、陈一阳被指“破坏文化大革命”，遭巡回批判。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以韦国清为首的广东省委以同一罪名，宣布逮捕“李一哲”三人，直到七八年，刚复出的老干部习仲勋、杨尚昆入主广东，他们才得以平反。

事隔二十二年，“李一哲”成员之一的李正天对文革狂潮进行了深刻反思。李现任广东美术学院教师，负责教授美术基础课程，没有任何职称。“评定职称时，要在填报的申请表里写上本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我拒绝了。”李正天说：“这不是以政治与学术挂钩吗？那份申请表我没有递交，所以我就没有被评上讲师、教授。”

三十年前，二十三岁的李正天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正留校等待分配。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李正天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年轻学生一样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并在这场政治动乱中结识了比较活跃的广州中学生王希哲、陈一阳。中国大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在一九七五年初召开，为了给这届在文化大革命步入尾声时召开的人大进言，李、王、陈三人在当时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人事科干部的郭鸿志协助下，写下了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其中的民主部分由王、陈人执笔，法制部分由李负责。署名“李一哲”则是从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

对于文化大革命，李正天并没有全部否定。他认为：在所有文献、档案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下，对文革的真正起因、意义进行判断、得出结论是不科学的。是不是现在成为主流观点的所谓权力斗争？如果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只要象当年打倒高岗那样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自下而上地大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搞？文革初期刘少奇派的工作组进驻学校的五十多天里，离开北京的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这五十多天为什么会被形容为“白色恐怖”？

李又说，他参加过“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是搞打击扩大化，搞迫害，搞“白色恐怖”；这种偏差又在文革初期出现，后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纠正了这些错误，受到普遍的支持、欢迎，刘少奇公开说他对文革运动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内情如何？刘少奇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没有周恩来那么高？所有这些都是要深入研究的。

李正天还认为，文革是在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全民享有所谓“民主”的唯一的一次。但毛泽东犯了错误，致使运动失控，这个错误源于他的“理想社会主义”。他后来的“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指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卑贱者最聪明”等等，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民众在文革时期都享受过前所未有的所谓“民主”，但造成的混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正天说：“这正是我后来致力研究法制理论的原因。由于缺乏法制观念，文革形成了无序状态。”

李又说：“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这很容易理解；但‘共和’呢？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好。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中华民国没有“共和”二字，但实际上是包含有“共和”的，例如五权分立。西方国家只是三权分立，而我们来了个五权分立，却没有真正、有效的实行。“共和”就是共而和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没有这样的制衡，社会就不会这样有序地发展。”

.....

李正天对大字报仍眷恋不舍。他说：“大字报是中国特有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先进国家都不会有大字报。中国老百姓没有公开、公平传递讯息或情绪的渠道，只好以大字报的形式来表达了。”

至于“李一哲”其他成员的现状，亚洲周刊获悉，王希哲平反后曾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后来再次被捕，出狱后已从商，最近在海外一份民运刊物上发表了文革回忆录；陈一阳则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宣称“不过问政治”，曾发表过关于发展中国大陆足球运动的理论文章；而郭鸿志早已退休，因不幸中风，长卧病床，不能过问世事了。

□ 摘自《亚洲周刊》五月二十六日号 输入：王祝丰

∞ ∞ ∞ ∞ ∞ ∞ ∞ ∞ ∞ ∞ ∞

“李一哲”案及其平反

• 大 海 •

韦国清（1913—1989，广西壮族人，1955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文革后期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掌管粤省军政大权，“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正出现在这个阶段。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最早出现在1975年11月27日《明报》：“及至文革后期，李正天被捕入狱，时逾年余，释放后，留校未作具体分配，每月干支五十五元，至去年春，‘反潮流’运动达到高潮，于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合写的大字报《广东怎么办？》再出现在昔日老地方，署名‘李一哲’，这便是‘李一哲’的诞生。

以后，‘李一哲’的大字报便不断出现，轰动省垣。”

“《南方日报》宣集文的文章批李，实际上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章，不料该文出了个大岔错，把毛语录的一句话用错了，被李正天穷追不舍，弄得极为狼狈。这李正天倒成了‘宠儿’，每天都有小汽车专送，住招待所，批判大会有他的发言权，结果往往弄巧反拙，成了反批判。据说所有中央委员都有‘李一哲’大字报一册，毛泽东对此还作了批语：‘这是一件好事’。”

韦国清1977年末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习仲勋、杨尚昆接掌广东、广州党政大权。习、杨关注‘李一哲’案，指示重新审查，次年李正天等人获平反，于79年初获释放，李正天留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

□原载《明报月刊》 96年六月号

~~~~~

【当事人语】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按：文革中的政治势力，从上层来说，主要是毛泽东为首的推动文革的一派，以及刘邓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派”。“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国内报刊关于文革历史的大量文章是“走资派”及其亲属、部属的回忆，港台及海外的报刊则常可见到代表下层的所谓“造反派”观点的文章。而代表文革推动力量的人，由于毛的去世以及“四人帮”的入狱，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声音。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巨大而令人遗憾的空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关于文革历史的任何结论都难说是全面的。以下所登载的是本刊力所能及收集到的这方面的材料。〕

## 戚本禹谈毛泽东、江青和文革

访问·陆源 整理·钟志林

〔编者按：本文节录“御笔痛批御医——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文中有关文革的内容。原文根据陆源同戚本禹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

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他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府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他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

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他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说清楚。……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

，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是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词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到文革时中国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灵魂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

……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彭真、陆定一的大难）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

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她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都要死命妒忌，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

〔原文注：本记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文责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

□ 摘录自《明报月刊》96年六月号

∞ ∞ ∞ ∞ ∞ ∞ ∞ ∞ ∞ ∞

戚本禹其人  
肖 江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一不知“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成员，该小组是六六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宣告成立的。在那特殊的年代，该小组手中的权力急剧膨胀，一度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到六九年四月，这个小组的成员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算结束这个小组的“历史使命”。戚虽是“王、关、戚”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都要通过戚，可谓权重一时。

戚本禹生于一九三二年，山东省威海市人，四九年前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党工作，四九年调到中南海工作，文革初曾任中共喉舌《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等职。六八年一月戚因文革中的“王、关、戚事件”被停止工作，不久又被隔离审查，八〇年七月遭正式逮捕。八三年十一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八六年初刑满释放（刑期自六八年初算起）。

戚出狱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如今已退休，他深居简出，回避记者，少谈政事，不写回忆录，更不让人拍照。退休后，他钻研学问，偶尔经友人邀请也作些讲学，近年甚至涉足商海。他化名“戚文”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他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三十五万字，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独到见解，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万字九大卷的《中华易学大词典》，并潜心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原载《明报月刊》96年六月号

∞ ∞ ∞ ∞ ∞ ∞ ∞ ∞ ∞ ∞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〇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

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

□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 ∞ ∞ ∞ ∞ ∞ ∞ ∞ ∞ ∞

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王平权为王力之妻）



.....

王力同志在中央文革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时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王力不属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中央文革的工作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经常参加和主持中央文革的会议，王力参加起草的一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自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军内一小撮”，“全面夺权”，“越乱越好”，“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等口号，都不是王力提出和发明的。当时有一个和中央文革平行的“中央专案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全都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这个专案组所作的迫害老干部等坏事，没有王力的份。王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就被关起来了，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提出“武装左派”以后，才由部队发枪，建立所谓“第二武装”，到一九六八年，武斗规模才越来越大，成为真枪实炮的武斗，那时王力已经早被关起来了。总之，王力不等于中央文革，王力不等于中央专案组，王力所参加的一段，只是文革初期中的初期，不能把中央文革的账，中央专案组的账，文革中后期的账，都算在王力头上。

在王力同志参加中央文革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王力起了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王力同志是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不论从思想上讲，从组织纪律上讲，他都不能超出这个框框。但是对某些具体事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也尽其所能作了些应作的事。如，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他是有保留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就要打到刘少奇，王力建议陈伯达约彭真和陶铸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作检讨，这才把整刘推迟了一年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王力在武汉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提“打倒刘邓陶”的口号。王力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几个内，坚持按常委名单发文件，即也要发给刘、邓，江青为此撤消了王力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江青动员王力在批邓会上发言，王力一言未发。王多次提醒主席：你不是说刘邓要有区别吗？主席也对王力谈了许多对邓小平的好话，主席说打倒刘邓只是打倒一两年，以后邓还要留在常委会，刘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对王力说他不同意对刘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王力把主席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江青等传阅，后来中南海揪斗刘邓陶夫妇，王力又把主席那段话抄下来送戚本禹和江青，江青很恼火。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在怀仁堂会议上王力是同意老前辈的意见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周总理要他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的记录，他整理后在会上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合乎事实。王力还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谈话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周总理亲自在会上宣读，陈老总拉住王力的手说：“写得好极了，要是这样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陈伯达要写一篇《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王力拒绝写，后来毛主席肯定王力的看法是对的。林彪、江青、张春桥在怀仁堂事件中进行了一连串不正常的活动，王力在秦城时加以揭发，专案组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报告的，不能揭发，王力还是坚持揭发了。

关于七·二〇武汉事件：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中央在北京定的，“四项指示”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向武汉传达的，王力既未参与制定也未传达这个方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揪斗王力，按毛主席的话说，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的回忆录也承认，王力是作了替罪羊。七·二〇以后，王力反对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反对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反对拍电影，反对全国游行。可是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

王力，是为了毛主席。”那王力当然就不好说什么了。王力再三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防止引起冲击军队的风潮。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王力这个当事人一言未发，并且递了条子，反对叫他们弯腰。周总理在会上说，“王力是处处捍卫军队的。”可是江青等后来却造谣说王力“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其实正是江青，康生等自己把军队搞乱了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康生接见学生时攻击北京卫戍区，从而引起“打倒李钟奇”的风潮，王力当时就递了条子，说不能把北京的军队搞乱。第二天即四月四日周总理让王力再作一次讲话，加以补救。究竟是谁“毁我长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所谓“八·七讲话”：有的文章说王力跑到外语学院发表了“八·七讲话”，这是谎言。事实上八月七日王力并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钓鱼台病床上听取外交部姚登山等人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有许多重要的话没有整理进去，如王力说，“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又如姚登山等人说：“我们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他加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放心。”这些话都没有整理进去。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在八七以前和以后，王力都没有过问外交部的事。外交部夺权，与王力无关。至于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揪斗陈毅，是江青组织的，那时王力不在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时，王力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在斗争王力的会上吴法宪提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的罪名，周总理立即插话说：“这没有王力的事。”

关于“反对周总理”：真正反对周总理，向周总理夺权的是江青。江青提出：“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他们在几个问题上，如有关军以上干部会议问题，五一节刘邓陶是否上天安门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问题……。他们利用这几个问题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围攻周总理，王力都站在周总理方面，为周总理讲话。武汉事件后邓大姐到钓鱼台看望王力，江青大骂邓大姐，王力为此和江青吵了一架。

.....

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说，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他们还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王力和江青的矛盾，上面已经谈到一些，在对京剧改革问题上，对彭真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对刘邓的态度问题上，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上都有矛盾。王力经常用毛主席的话来纠正江青的话，还有王力向毛主席反映，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毛主席立即调阅了那个文件，并责令中央文革公开检讨。这更使江青对王力恨之入骨。江青本来就说：“你王力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武汉事件后，王力反对他们的一系列作法，她再也不能容忍了。而且由于他们自己把局势搞得很乱，不可收拾，她正好把王力“端出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羊。江青用毛主席最忌避的话来进行挑动：“武汉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是他的了，不是毛泽东的了。”毛主席才问：“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江青借着这句话就到处说：“毛主席问王力是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证明王力是苏修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们又诬陷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才引起毛主席对王力的怀疑，当然打倒王力同打倒其他人一样，最后都是要毛主席点头的。把王力关起来后，周总理还指示：不许贴王力的大字报，贴了的要覆盖；王力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管；对王力问题不要无限上纲。当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王力同志的几句话：“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还没有把王力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关到秦城后，毛主席周总理也不让

任何人提审王力，江青就用放噪音，灌药，假枪毙等办法来折磨王力，力图置王力于死地，杀人灭口。

.....

王平权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 ∞ ∞ ∞ ∞ ∞ ∞ ∞ ∞ ∞ ∞

关于王力·关锋  
• 肖迅 •

“王关戚”是文革初期出名的“革命秀才”，除戚本禹外，王、关二人简况如下：

王力：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革初期，和关锋、戚本禹一起红极一时。许多重大事件都与他们有关。一九六七年五月，武汉市两大派造反组织在如何看待武汉军区“支左”问题上发生分歧，导致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七月，王力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前往武汉处理两派武斗，二十日，他被拉到军区大院围攻<sup>①</sup>。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支持这项行动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就其发生的日期，简称为“七·二〇”事件，王力因此事件更名噪一时。不久，他作为高干子女为主所组成的红卫兵“五·一六”小集团（被中共中央认定为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sup>②</sup>的后台，制造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等严重案件的祸首而遭整肃。六七年八月被隔离审查，六八年一月起被囚于北京秦城监狱，八二年一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于起诉书》，同月获释。

王力生于一九二一年，三九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副主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这些年来，他始终“自我感觉良好”，四处走动，参观亮相，接受采访，撰写回忆录，遭到一些媒体的抨击，在社会上引起多场“风波”。这位“不甘寂寞”的人，被指责为“阴魂不散”，他连续写出《一年零两个月》（内含《文革第一年》）、《王力回忆毛泽东》、《漫谈舒同》等，不久前又写出《王力回忆王稼祥》。

与王力谈话，他依然三句不离政治。他以三句话概括他当今的政治观点：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邓小平这面旗帜不能倒，对“江核心”要拥护，要保护。

八四年二月，王力被确诊为患贲门癌，八八年十月被发现癌扩散，他连遗嘱都写好了，九六年五月，他在北京动了胰腺手术，据王的家人透露，他的病情不是太好，手术是否成功，尚难预料。<sup>③</sup>

关锋：本名周玉锋，又名秀山，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岁加入中共，三八年任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一年后改名关锋。五〇零年后，任中共山东分区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五六年被借调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五七年，在反右派运动中，作为“左派新秀”，他崭露头角。两年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被调往那里，先后任编委、常务编委。文革爆发，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国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和王力一样，因“王关戚案”遭关押，后被免于起诉，同样被开除中共党籍。

他和王力截然不同的是，出狱后只顾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他坚称“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他绝不写回忆录，实现“四不”：关于文革的文章，他“不看、不想、不谈、不写”，一心从事老子、庄子、孔子研究。早年，他曾用“庆云”作笔名，庆云县是他的出生地，在山东省和河北省的交界处，近年以“古棣”作笔名（庆云县前身是无棣县，古棣即古代无棣）。如今，他有三大爱好，即看古书，看电视，做气功（主要是香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著作的撰写上，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和古文字学、古音韵学。九一年，他与夫人合作的八十万字《老子通》出版，此书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常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他近年撰写成或和人合著的选有《惠施及先秦名学》、《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等著作。

□原载《明报月刊》 96年六月号

编注：

①当时被派往武汉处理两派武斗而遭到围攻的，是谢富治和王力二人。谢的地位不在王力之下。

②“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小组织，后来给它按上的罪名是“极左”、反对周恩来等等，并无以“高干子女为主”的说法。

③据最新消息，王力于本月二十一日去世。中共当局决定以“普通干部”待遇为他治丧。

~~~~~

【历史回顾】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
——访牟志京博士

• 亚 衣 •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幅对联，对于文化革命时期的大中学生来说，也许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今天的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牟志京，当年曾经是“血统论”的坚决反对者，刊登遇罗克的惊世之作《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的主编。日前，牟志京博士参加了在本刊举行的“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并在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 中学时代就遭批判

亚：您在“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使很多人感到兴趣，您是否可以给本刊读者就个人的经历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牟：我对童年的回忆从大连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开始。记得自己小时候就颇有爱国意识，当我第一次知道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时，难受了好几天。一九五八年我随家人迁居北京，父亲牟其如专门从事技术资料的翻译，出版过大量的译著。我的爷爷在抗战结束前是个“资本家兼地主”，为大连的富户，奶奶却经常接济穷人，连得街上许多讨饭拣破烂的人都认识她。奶奶善良的心地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后来进入北京市第四中学，在政治上一直遇到麻烦，主要的原因是我把政治当做物理、化学一样的学科来学，经常提出一些疑问。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我就成了四中被批判的学生。

亚：这很奇怪，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后来推及工厂和机关，在中学生里怎么也搞“四清”？

牟：这确实特殊。北京四中是一个很左的学校，一九六五年，四中是北京市教育局的“四清运动”的试点。记得那时同学们对我贴的小字报一批又一批。

亚：当时对您的批判主要有那些内容还记得吗？

牟：主要是三点。第一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是从我爷爷那里算起的。以往我曾经和同学交换日记，搞运动时同学们就把我日记里的一些内容抽出来批判。另外是批判我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这很好笑，四中是一个男校，根本没有机会与女生交往，主要是因为我看了些电影，发表了一些评论，他们就批判我“恋爱至上”。还有一个罪名是鼓吹资产阶级阶级路线。这是因为我在政治上非常幼稚，自己不是共青团员，但是对团的事情却感到有责任加以评论。看到班级里三个同学被批准入团，另外三个没有入团，我就对团支部书记说入团的三个同学不如没有被批准的三个。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出身，到批判我的时候才知道入团的三个同学都是出身好的，而没有被批准的三个人都是出身不好的。

亚：对您这个“反动学生”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牟：不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那时我读高中二年级。三年后，在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一九六九年初我到白洋淀农村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雁北插队，直到一九七三年转到化肥厂当合同工，七四年到大同铁路局当工人。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之后，我通过考试，进了大学，又马上报考研究生，想不到在大学里受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迫害。

亚：您考取的是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

牟：是北方交大，前身是北京铁道学院，我在电讯系，读铁路信号自动控制专业。我实在不想提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领导很多是在文革中上台的，他们的子女被恢复的高考制度卡住而没有进入大学。我是北方交大中唯一的一个几乎没有上过大学就考上研究生的人，七七届的大学生是七八年三月入学的，同年五月开始报考研究生，实际上我没有上过大学课程。学校里的当权者把我看成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我要报考研究生，他们不给我报名表，我后来到北大去拿了表格。后来我又是学校中第一个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的，而且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答辩，但是由于政治上不受信任，学校不给我授予硕士学位。于是，我这个中国铁路信号系统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在中国极其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被分配到原单位大同铁路局。

亚：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九八一年了吧，这个时代的气氛与文革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你们那里的大学还是这样对待研究生？似乎不可思议。

牟：有人说北方交大是一个党校，左得很。我随手给您举个例子，学校有两个副校长，都姓杜，一个是很有名的教授，文革前就是中国电子学会会长。住房只有一间，与孩子睡上下铺。另外一个副校长也姓杜，刚刚调来，还没有到校，学校就为他准备房子，把四户人家赶出去，给这个人四间一套的单元，而这个副校长只是不带家口的一个人。原因何在？那个教授副校长不是党员，而新来的副校长是党内人士。

一九八四年，我拿到奖学金自费来到美国在耶鲁大学读书，先后五年，拿到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分而治之的数学模型和它的并行处理》，被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推荐为当年最优秀的博士论文。一九八九年开始在布兰德斯大学任Assistant Professor，六年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带出了两个博士和四个硕士。今年一月，为抗议这个大学计算机系对中国大陆学生招生

不公，辞职来到IBM的超级计算机部门工作。

◇ 《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

亚：当年您所就读的北京男四中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在这一类学校里，您有什么感受？

牟：北京四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它建立于清朝，在解放之前名声就很好，文革前学校中拥有的特级教师的比例很高，高校升学率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加上离中南海又比较近，许多高干子弟就被送了进来。周恩来的养子也在其中就读，我一进学校听到的一个新闻就是邓颖超从中南海步行到四中来开家长会。当时在我们学校，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永、薄熙成、薄熙来，彭真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出了不少风头的贺龙儿子贺鹏飞。四中不是纯粹的贵族学校，而是很多高级干部走后门把子弟送进来的，形成了高干子弟比较多的局面，这使得它在文革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些权贵子弟，构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老红卫兵的骨干。

亚：我看到了您保存的文化革命初期主办的《中学文革报》的全套复印件，请您介绍一下当时主办《中学文革报》的过程。

牟：在我眼里，运动一开始就有很多让人不理解的地方。在学校私设的小监狱里听到被打的人的嚎叫时，我第一次对这个制度发生了疑问。我看到老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街，被泼屎浇尿，几天之内老师就有自杀的；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把人从卡车上拉下来鞭打，让从周围的女校抓来的女学生蹶着屁股挨打。我开始在心里第一次问，这是什么世道？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红卫兵组成了，开始时自己也一直试图要参加，但是红卫兵的参加资格是看你什么出身，没有什么别的标准，非红五类不能参加。这样学生一下子就分成了两等，一种是耀武扬威的好汉，另一种就是“狗崽子”。与当时红卫兵运动相伴随的就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亚：《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刊登的《出身论》就是批判这个对联的，是吗？

牟：在我们学校里放的彭小蒙的讲话录音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对联，后来又听到江青讲话表示支持这种革命精神。我很震惊，马上跑到清华附中去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这种观点。这个对联出来之后在北京引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辩论。一天我去中央音乐学院，见到辩论会上发言热烈，人人慷慨激昂，大部分是赞成对联的。我递上申请发言的条子，大会主席问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对联的？我说是反对的，于是就让我上台发言。我当时的理论根据很有限主要是出于一种朴素的人道的感觉，觉得对联荒唐。我在台上讲了不久，就上来几个穿军装的女红卫兵，抢我的话筒，朝我脸上吐唾沫。四中有几个学生还上来揭发我如何一贯反动。回到学校，班级里红卫兵召开会议，说出身不好的人谁说自己不是狗崽子，现在就站出来！说实话，班上“出身不好”的还真是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一个刘姓同学，是四中有名的打手，后来是“西城纠察队”的头目之一，此人殴打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起来打抱不平，也被他打落了一颗门牙。

亚：在那时，这个对联对于任何人都有着切身的现实意义。

牟：是的。“革命大串联”开始，红卫兵规定非红五类子女不准串联，我就带领一些同学到中南海去请愿。而且我还自己决定外出串联。在串联的过程中，现在看来很可笑，我真诚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工、学农，拜访过各地的革命圣地，重庆的渣滓洞，遵义会议的会址，新疆毛泽潭的烈士墓，又长征，从西安走到延安，一路

上坚持学“毛选”。后来中央说停止串联，我就回来了。在串联前有的老红卫兵对我趾高气扬，在我串联回来时，却对我很客气。我很惊讶，后来才知道批判资反路线了，对这些老红卫兵有冲击，造反派也开始在学校里形成，我同情造反派，但是总觉得他们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出身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亚：据说因为您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周恩来曾经表扬过您，您能不能说说其中的详情？您对周恩来此人的评价如何？

牟：前面说过我很早就批判那个“血统论”的对联，所以就被当时的造反派看成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范，在学校里受到很多的尊敬。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两个发言的主要代表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发言的主题是“宣判资产阶级反动对联的死刑”和“解散西城区纠察队”。在发言中讲到了我因为反对“血统论”对联，要求串联而遭到了西城纠察队的殴打。他们讲完后，周恩来就说，刚才听到那个同学的故事，很受感动。尽管周恩来没有提我的名字，我在当时听了也非常受感动，这件事情在“首都兵团战报”上登载过。我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别的交往。对他作不出什么特别的评价。

亚：您的报纸就是在这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下办的？

牟：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一篇谈出身问题的文章，说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六十五中的遇罗文，就是遇罗克的弟弟。在我找到遇罗文之后，两人谈得很投机。就想把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当时因为周恩来的表扬，使得我有可能从学校借出五百元钱。我还通过小学同学开了介绍信，到印刷厂印文章，突然产生了办报纸的念头，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学文革报》就创刊了。

报纸第一期印了三万份，后来印六万份。《出身论》一共印刷了十一万份。报纸的影响很大，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除了西藏和台湾外，其它各地都有来信。可见当时的反响有多大。因为来信太多，邮局不送，每天我们要到邮局去拉两麻袋信。报纸定价二分钱，在外面最高可以卖到五元。在西单换报市场上，曾经以一比一百换其它小报。《中学文革报》一共出了六期，每期有一篇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实际上是遇罗克的文章。办到第三期时，中央文革的关锋派了《红旗》杂志的两名记者找我，说我们报纸方向是错的，必须悬崖勒马。我坚持办报纸，编辑部也从三个人发展到大约二十人。后来风声渐紧，我们就召开编辑部会议，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就马上退出。令人感动的是无一人退出。

亚：《中学文革报》后来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牟：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正式宣布《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是反动的，关锋，陈伯达都批判过我们，后来林彪在五月的一个长篇讲话中也不点名的讲了《出身论》的事情。我想，我们的报纸和《出身论》确实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他们是一个震动。

◇ 遇罗克与他的冤案

亚：就共产党本身来说，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因此它对于“血统论”或“成分论”历来赞成并付诸所谓“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实践。但是在文革中，共产党的一些当权者又时而批评“血统论”，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牟：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我虽然在文革中卷入很深，但是

对它的内幕知道得很浅。我只是从一个很朴素的态度卷入的。不过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观察，在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同时发生的是一个打倒运动，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结果是你打倒我的老子，我打到你的老子，这样一来，那些人的老子成了“黑帮”，儿子也变成了“混蛋”。干部普遍打倒，混蛋也就越来越多。许多对联的鼓吹者成了对联的讽刺对象。老红卫兵的全面打倒使得政府机构全面瘫痪，危及到共产党本身的利益，这样共产党就要对老红卫兵有所控制，批判对联也是这样的目的，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亚：您是否可以再详细谈一谈与遇罗克的交往？

牟：我和遇罗克的第一次打交道是因为对《出身论》的修改，这个报纸是我一手弄起来的，社论由我写，稿件由我组织，对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这篇文章，我也作了修改。在修改中我与遇罗文发生了争执。但是第二天遇罗文对我说，小组的人认为我的修改很好，其实这个小组就是遇罗克。后来遇罗文就带我到他的家里去，第一次见遇罗克，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非常厉害，脸色是罕见的苍白，眼睛近视到只剩下一个个圈。但是眼光犀利，说话的声音洪亮，机智又幽默。我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久闻大名，如雷灌耳”，笑声极有感染力。遇罗克博览群书，文学的功底很厚。我与他的来往带有一种崇拜的心情。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的住房边上搭起的被称之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总感到非常温暖。

遇罗克在政治上相当敏锐，我们曾经谈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姚文元文章，他说交稿时候是六五年十二月，如果是现在，就不会同意发表了，因为他已经看出这不是一场学术斗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后，他还与我谈起考虑企业改革和工资问题，正在着手写的长文的题目是“工资论”。遇罗克真正是在为中国的前途而思考，他是右派份子家庭出身，受到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如果说出身问题与他的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工资和企业的问题则是完全是忧国忧民的考虑了。

亚：这可能与他的经历也有关系，他和你们学生不一样，是个工人，对吗？

牟：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械厂的工人，我把遇罗克当做师长。当时我们所有参与报纸工作的中学生都没有被抓，当时中共中央有一个政策，对所有中学生的政治问题一律不予追究。公安局追查时我作了被抓的准备，但是很快我就感到他们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遇罗克。我们是中学生，遇罗克是工人；我当时才十八岁，而遇罗克已经二十四岁。而且当局的情报也很清楚，“出身论”的真正的作者是遇罗克。在临被捕之前，遇罗克曾经和我说过，“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我说不能这样说。他说尽管如此，还是要托我一件事情，他有一封“致毛主席的信”，让我保管，在适当时间拿出来转交有关方面。说来遗憾，那时我也开始受到公安部门的注意，不得不作准备，把一些东西东藏西藏，因为期间换过很多地方，到后来竟然找不到这封信了。

亚：在我所看到的材料中，提及遇罗克当时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组织反革命集团”，您能说说这个情况吗？

牟：大约是一九六八年底遇罗克被捕，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在公审大会之后被处决。罪名确实是两个，一个是思想反动，有十万字的反动日记，但是这一点还构不成死罪的，还有一个罪名就是暗杀毛泽东，就是您说的“组织反革命集团”。但是证据也完全是强加的。事情的起因是文革报的成员六七年夏天到长春串联，那时正好遇见两派的武斗，我们一下火车就有人向我们发武器，其中也有手榴弹。在我们离

开长春时候，我对大家说把武器都缴回给当地人，遇罗文却把一颗手榴弹给带了回来。他是一个非常爱好化学的人，他给我作过多次化学试验，做过催泪弹，小小一滴，就可以把整个屋子的人弄得喘不过气来。他还在颐和园发射过小火箭。我想那个火箭的火药就是从手榴弹里拆下来的。这就是他带回手榴弹的目的。他这个人很幼稚，不仅在那个时代冒险带回手榴弹，而且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至少两个人。我当时也很奇怪，原先公安局一直逼问我遇罗克有什么反动言行，后来突然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问手榴弹的事情。而当时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我看见遇罗克的判决书，才恍然大悟。其实抓遇罗克的真正原因是他撰写《出身论》。

◇ 从世界舞台看“老三届”

亚：按照通常的说法，您属于“老三届”。在现时中国大陆，与“新中国”几乎同龄的“老三届”，还有所谓“老三届文化”成了热门的专有名词。对于“老三届”这个特定时代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群体，您有什么评论？

牟：我觉得放在世界舞台上“老三届”，与六十年代很有关系，六十年代的世界似乎很特殊，在美国，六十年代长大成人的是所谓“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变革。这一代人在历史上很有趣味性。中国的“老三届”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出于现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必然因素，与当时世界舞台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情相呼应。当然中国的老三届有一些特定的东西，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政治信仰上经历了一个激励的，急促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转变，他们的大多数被扔到了社会的底层，插队当农民，在工厂做工人，生活上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时期，而在时间上却获得了充分的思考。当然不少人荒废了自己的青春，放纵自己，《新闻自由导报》上连载的芒克的《野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人物。在城市中这一代人物的迷茫，彷徨和荒唐的犬儒主义行为也是老三届之上和老三届之下都没有的。当年的打手后来写书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打手后来写过小说，叫《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亚：我看过这部小说，是不是在文末有一段关于佛道空门的议论？）是的。

亚：我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同属老三届的年龄时段的人中间，有像您这样在文革前后中受到血统论的迫害，现在来到国外从事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也有像您前面提及的当时殴打您的红卫兵，现在又成为编故事写小说的作家的人，有趣的是，我在德国的朋友仲维光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一位叫张承志的，当时是清华附中的同学，现在是国内的作家，在文革中也打过仲维光。就你们这样两类人而言，差别就很大，不光是职业上的，而是在精神和理念甚至整个价值观上差别都很大，用“老三届”这个词，又如何概括得了？

牟：您说得非常对，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我还想说的是，围绕着出身问题，老三届中的人被深深地割成为两个层次的人。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文革初期的对联所造成的隔阂，从来没有被弥补起来过，中学时代的同学，直到现在，这几年我回到北京，人与人的来往基本上还是不超越这个界线，这首先是围绕出身形成的断层。记得当年插队时大家临分手，老红卫兵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今后你们这帮子人拿笔杆子，我们拿枪杆子，看谁有权力”。果然，这些人现在不少是军区司令，副司令的，而当年出身不好的，现在大多是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的。当然在同一个出身层面，比如知识份子出身的当中，也有一部分颓废，堕落，一部分孜孜不倦追求真理。

亚：“老三届”也许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家的一个课题来源。

牟：真是五光十色。我们有一个同学叫张约海，发表了很多政治言论，之后跑到缅甸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最后战死在缅甸。还有一个同学赵京青，努力研究经济哲学

理论，写了经济和哲学方面的手记，因此被捕。遇罗克是更早期更典型的一位。一九六九年、七零年被枪毙的大量政治犯中很多是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当时我记得有很多讨论国家大事的沙龙，也有男女之间乱交和群交的沙龙。芒克和我同时在白洋淀插队，我相信他写的《野事》是一些真实的故事。但我读《野事》的一个强烈的感想是，人们可以经历同一个历史阶段，却会得到几乎没有相交的生活经历。我在白洋淀插队时，满脑子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我的第一次恋爱的经历也开始于白洋淀，但是与《野事》中描写的却是完全不同，我把爱情看做非常纯洁和神圣的东西；再有，《野事》里有很多与当地农妇或农村姑娘的恋爱及性经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写的大量农民在性生活上的随意态度，我也一无所知。所以我想在同一个生活阶段，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

◇ 我尊重当农民的经历

亚：我还想顺便与您讨论一下“造反派”问题。有人认为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要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他们代表了人民对独裁政权的反抗。

牟：我对文革的卷入自从《中学文革报》被批判之后停止。我对此后文革的变动实在感到莫名其妙。虽然我试图努力去了解和理解，比如，东北武斗时我就去东北，四川武斗时我去四川，我见到的武斗最厉害的是在长春，真枪真炮，尸首遍地，本人也几次遇到生命危险。我试图想了解事情究竟怎样，可常常是听了半天没有听出什么名堂，我没有发现什么根本的原则问题，无非是这一派说那个人是革命的，而那一派则说另一个人是革命的，双方都认为是造反派。我所插队的白洋淀农村也有武斗，临近的两个村子，一个支持三十八军，一个支持河北军区。有一天打了几小时的炮，一方攻下了县城，用铁丝把对方的男人从肩胛骨穿过去，女人从肛门中穿过去，然后押着去枪毙。所以我很快对这些造反派疏远，对各地的派性斗争都没有兴趣。

亚：从比较公允的立场上来看，当时两派的大多数民众是否还自认为在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牟：我觉得这是一场利益的争夺战，看谁掌权，谁要掌权，就要把对方压下去。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扣上一个反对革命路线的帽子。主要是利益问题。当然争夺利益的主要是当权的头头，下面的群众就难说了。

亚：笼统地说，在文革中造反派有没有那种反对共产党的官僚体制的人民革命？

牟：看不出来。在农村还有一种家族的斗争掺杂在其中。不过，在早期在中学里那些造反派，倒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造“血统论”的反，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相当明显。这个阶段定义得很好，就是到中学生插队为止，之后就没有了。

亚：在文革中，许多青年学生像您一样有过一段当工人与做农民的经历。您是否认为这样的经历还是具有某种正面意义的？

牟：从个人来讲，这一段经历毫无疑问有非常大的正面意义，我非常尊重自己的这个经历。首先，它给了我时间去思考，我相信一个人深刻的思想需要时间。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书。第一个阶段我主要关心的是政治、哲学，包括赫鲁晓夫传，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及历史书籍；第二阶段是外国文学的名著，影响我最深的是俄国文学，我把屠格涅夫的八个中篇，托尔斯泰的主要著作，还有冈察洛夫的书，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都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屋里一直挂着《堂·吉珂德》的插图，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后来由于自己在恋爱上的挫折，所以文学书一律不看，专读科学和数学、物理。这是我读书的第三

阶段，也因为如此，我后来就直接考上大学和研究生，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搞科学研究。

亚：我的意思是，从您当一个工人或者农民本身来说，对您的人生发展的意义何在？

牟：我在农村下工的时间还是不少的，我是村里有名的力气大的人。读书主要是利用回城的时候读的。我觉得当农民的意义首先在于了解了农民，无论在白洋淀还是在山西，我发现真正的农民非常纯朴可爱，也很聪明。看问题一针见血。实际上我对很多政治问题的最终答案，是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我在山西遇见一个农民，他看瓜田，我看胡萝卜。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经过了长时间的交往有了信任之后，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问他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他说他是解放前村里最穷的人，那时没有电灯，没有尼龙袜子穿，但是有一点，可以吃饱肚子。现在一天只有两顿，而且是稀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村子解放前的粮食产量是一年一百五十万斤，现在是八十万斤；人比以前多，是解放前的两倍多。现在谁都不好好干活，而且不好好管地，地里也越来越不长庄稼。

◇ 中国人的人权也要在世界各国争取

亚：您在前面提到您为了维护中国留学生的利益辞去了布兰德斯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的职务，您愿不愿意就此作一些说明？

牟：布兰德斯大学的历史非常短，建于一九四八年，在美国每年排名是第二十五到五十之间。此校是为了犹太人在第二次大战中的难民的教育而设立的，所以这个学校在美国一直非常开明，反对种族歧视，尤其是反对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历来一马当先。我在任教时，观察到申请就读这个学校作博士生的中国学生非常多，到我临离开时候，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而我们这个系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却不重视。一九九三年主管招生的人在教授会议上说中国学生的申请是为了到美国“切馅饼”，完全没有必要看他们的申请。我就与他辩论。在一九九五年中国学生竟然一个都没录取。我问系方，他们说对中国的大学不了解。我当时作了一个调查，中国学生的GRE平均成绩要比外国学生的平均分高出一百四十分，中国学生中已经拿到硕士学位的比例也是其它国家学生的一倍。每十个人当中已经有论文发表的比例也高出其它国家的学生。这些数据至少说明中国学生不比其它国家的学生差，应当被考虑。这个学校收的学生大量来自欧洲和南美，还有其它亚洲国家。我就问招生者，你说对中国不了解，难道对阿根廷、印度、南斯拉夫、孟加拉国了解？如果对中国情况不了解，那么你们还可以问一问这里的中国教授，而这里并没有一个教授可以回答孟加拉国大学的问题。我开始在系里与他们辩论，后来又到学校一级提出这个问题，《世界日报》也发表过有关文章，在电脑网络上也发送过这个信息，收到了大量支持的。有许多家长诉说子女在这个学校受到的不平等遭遇。大学的教务长对我说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关心的应该是科学。我回答他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科学家。我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招收了两个中国博士研究生。后来我辞职离开了这个学校。

亚：在国外已经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的学者，能够尽力帮助自己的学生同胞，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

牟：我觉得在布兰德斯大学的这一场争论与我当年参与关于出身问题的争论有类似之处。一个是对出身的歧视，一个是对种族的歧视。这里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智力来辨析，需要的只不过是公平和良心。在两次事件中都有人劝我，这样的事情与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论出身，“职员”出身的我并不是被打击的主要对象；在布兰德斯大学，我个人的地位并未受到任何威胁，与学校校方发生争执对我的个人升

迁“事业”反而有影响。但是，凭着良心，我如同当年。

亚：作为一个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读书和工作学者，您对海外中国民运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和希望？

牟：我不是任何一个民运组织的成员，但是我有很多民运人士的朋友，我自己也一直关心着民运组织的活动情况。我在美国的十几年的经历使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具有相当多的不合理的成份，贫富的分化使我感到非常愤慨，美国的少数民族有受压迫的地方。我对海外民运想说的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的人权，不仅要在中国争取，也要在美国和其它所谓的自由世界中争取，我希望民运组织能够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亚：您的这番话语很具启发意义，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 《北京之春》37期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徐名扬（澳大利亚）<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吴慈仁（香港）<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熊波（美国）<cnd-info@cnd.org>](#)
[关蔚禾（美国）<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代主编：[徐名扬（澳大利亚）<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冰（加拿大）<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本期编辑用软件：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来稿与日常编务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